

# 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 ——当代中国文学思想的人类学转向视角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从学术史来看,多元文化视角虽然直接源于20世纪迅速兴起的一个学科——文化人类学,但其推广应用的领域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当代中国文学理念和文学思想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重要变化,可用“人类学转向”来概括。本文审视文论界和比较文学界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潮流——文学人类学,梳理其学术理念和研究范式的发生。西方知识体系的普世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使现代性建构的文学学科的贵族化取向受到后殖民主义的反拨。各民族着眼“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给国际的文学研究带来多元文化视角的变革,体现于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及研究实践。分析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评述其对人文研究方法创新的贡献——“四重证据法”,以“黄帝号有熊”为个案,可以展望四重证据法在人文研究领域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文学人类学;本土文化自觉;四重证据法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

[作者简介]叶舒宪(1954—)男,北京市人,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神话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3-0087-04 [收稿日期]2010-12-22

### 一、文学人类学在中国

比较文学是文学诸学科中唯一以“比较”命名者。与之相应的文化人类学,则享有“比较文化”的别称。将这两个以“比较”冠名的学科界限打通,其交叉与融合部分即可名为“文学人类学”。中国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是各个民族国家从彼此封闭走向开放交流这种大趋势在文学研究领域催生的结果,并将这一趋势的发展前景称为“文学人类学”,以此来替代昔日的“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等术语。文学人类学和文学理论及比较文学的关系,就像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需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审视。

19世纪后期,文化人类学的兴起是以帝国主义全球殖民扩张和对原始文化的发现为前提的。它以科学态度和文化相对论的眼光重新认识“原始人”及其文化。人类学家关注文化他者,不仅给西方文化价值观带来影响,也为20世纪的文学艺术催生出“人类学想象”,并在艾略特、庞德、布列东等人的诗歌,高更、毕加索、摩尔等人的造型艺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乔伊

斯、福克纳、D. H. 劳伦斯、纪德、马尔克斯等人的小说中大放异彩,形成了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浪潮。21世纪以来,作家、艺术家更加自觉地运用人类学想象和跨文化视角,催生出文艺创作的“人类学转向”,从21世纪最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到最具影响力的影片《阿凡达》,从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1Q84》到大江健三郎的《水死》。当这类多元文化视角的作品借助于文化产业的推动力向全球文化市场普及,一种从“民族文学”单一视野到“文学人类学”多元视野的文学典范转移现象,成为摆在文学理论研究界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文学得到复兴,并在1985年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若将1985—2010这二十五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一分为二,则1996年长春的第五届年会为一个转折点。在这次年会上,学会领导倡议成立二级学会——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海南大学率先将文学人类学作为重点学科,启动了“文学人类学论丛”的编辑出版计划<sup>①</sup>。1997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厦门召开,会上展开了学科

<sup>①</sup>由海南大学资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陆续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共有八种,即《文学与治疗》、《性别诗学》、《神话何为》、《神力的语词》、《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中国古代小说的母题与原型》、《神话与鬼话》、《文学与人类学》。

交叉与互动的对话 对文学人类学的性质、研究范围与方法论达成共识。会议论文集《文化与文本》的编辑出版 推动了当代文史研究中的文化阐释潮流。

“文化文本”的概念,首先意味对文本阐释的合理方式同样可以运用于对文化的阐释。中国文史研究的悠久传统以考据为核心方法,受到人类学转型的刺激后,从单纯的考据研究转向了文化阐释,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变。文学人类学研究会草创者们在20世纪末启动重新解读中国上古经典著作的研究计划“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第一部研究著作——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年),重新解析了包括屈原的名字和《离骚》的字义在内的诸多疑难问题。第二部是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年),解读了古汉语中“诗”的口传文化渊源及其与盲人祭司群体的特殊关系,辨析了华夏文化中诗歌的多样性文类系统及其与诅咒、占卜、祈祷、判案、求偶等文化活动的联系。此后,又有萧兵、叶舒宪合著的《老子的文化解读》(1994年)、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1994年)、王子今的《史记的文化发掘》、叶舒宪的《庄子的文化解析》等。文化阐释作为文学和历史研究的一种风气潮流,波及了整个学术界。从二十年前的语境看,当时接纳“文化阐释”派的不是古典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恰是比较文学界中的文学人类学者。如中国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院士所说,虽然中国在国际人类学领域处于后进地位,但在文学人类学方面却成果丰硕,还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体现出一定的先锋性。为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难题是:中国学术传统如何在方法论上同外来的西学理论和范式形成有效的对话与结合。1990年代中期逐渐成熟起来的“三重证据法”理论,立足于中国传统与西学比较方法的现实汇通语境,是文学人类学趋向独立的方法论基础。简言之,所谓“三重证据”指非文字的活态文化传承,包括口头传统和仪式等。

王国维于1925年在清华大学讲《古史新证》课时,提出利用地下出土甲骨文探讨上古史的“二重证据法”给现代人文研究树立了创新的表率。随后有茅盾、苏雪林等用比较神话学的眼光研究汉籍中的神话,又有闻一多、郑振铎等取法弗雷泽派的人类学,重新解释中国古典。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到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再到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和郑振铎的《汤祷篇》,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及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等,三重证据法的应用呈现出蔓延态势。

历史学家杨向奎、饶宗颐 and 笔者等,曾分别提出三重证据的说法。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作者以自序“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更新”为全书起始,梳理出现代学人运用三重证据的研究经验,特别是人类学的比较文化视野,如何作为超越古人的第三重证据。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在21世纪之初,“四重证据法”应运而生,成为文学人类学者自我超越的方法论路标。

文学人类学通常被理解为以人类学的视野思考和研究文学的学问<sup>①</sup>。显而易见,这是文学研究者在人类学影响下探索的一个跨学科领域。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史,相对于在她问世之前的国别文学研究史,显然只能算是非常年幼的新生儿。文学人类学的发生,既有其国际跨学科潮流的大背景,也有中国现代学术语境的特殊需要的现实语境。简言之,一是19世纪后期以来蓬勃开展的多元文化比较的研究潮流;二是人类学的知识全球化之整体视野;三是从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到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公正理念。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知识全球化视野给单纯的一对一比较(X比Y模式)带来挑战。后殖民主义批判有助于消解精英本位的文学观,启发学者去发掘长久以来被文化霸权所压抑的非主流的、无文字的、边缘族群的文学,从而将比较文学家设想的带有贵族化倾向及霸权色彩的“总体文学”观念,引向文学人类学的民主化方向。

文学人类学研究者认为,沟通文本与口传、神话、仪式与现实存在,重构原始与文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联系乃是该派批评的价值所在。新问世的系列著作体现出这样的探索,如徐新建的《山寨之间——西南行走录》(2004年)、吴秋林的《众神之域》(2007年)、孙文辉的《巫雉之祭——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2006年)、巴莫曲布嫫的《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诅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2004年)、吴正彪的《苗族年历歌和年节歌的文化解读》(2006年)等。

20世纪末叶以来,比较文学和整个人文研究领域出现的“人类学转向”正是百年积累下来的跨学科研究趋势的结果,是类似于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的一种影响深远的学术转向,它预示了未来引导知识全球化视野和知识创新整合的潮流。进入21世纪,随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新学派,并波及港台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设立的文学人类学(或称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

<sup>①</sup>相关的论述可参见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程金城主编《文艺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叶舒宪《文学人类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立文学人类学研究机构 参与了 985 项目“文化互动与文化遗产”等课题研究。2005 年至 2010 年,先后在湖南科技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和广西民族大学召开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二至第五届年会”。组织和协调全国从事相关研究的两只力量——语言文学研究者和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者,将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和范式推广到边缘性的少数民族地区。目前,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建立的田野调研作业基地,希望将被现代学院派所架空的“中国文学”概念还原和落实到多民族活态文学的现实土壤中。

近年来的相关著述有杨朴的《二人传与东北民俗》(2001 年)、容世诚的《戏曲人类学初探》(2003 年)、彭兆荣的《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2008 年)、《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2009 年)、徐新建主编的《灾难与人文关怀:汶川地震的文学人类学纪实》(2009 年)、《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与族群》(2009 年)、叶舒宪的《神话意象》(2007 年)、《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2009 年)、高莉芬的《汉代歌诗人类学》(2006 年)和《蓬莱神话》(2008 年)等成果。这些著述或把神话观念与仪式结合起来研究,或从古今文学叙事模式中发掘仪式原型,或深入民间考察至今还存活的仪式与信仰、神话的关系,将典籍记载中故去的神灵和现今庙宇中尚在供奉的活神联系起来,显示了人类学的仪式视角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改造。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2004 年)对于比较文学的主题学和形象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在总结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经验和在学科理论方面,程金城主编的《文艺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2007 年)、吴广平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类学与文学研究的互动经验。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2003 年)系统研讨了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关系。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专业教科书《文学人类学教程》出版,该书立足于本土多民族文学再认识,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提出了操作方略,着重强调了四重证据法的应用。

新世纪以来,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长。高校的博士论文有徐鲁亚的《神话与传说——论人类学文化撰写范式的演变》(中央民族大学 2003 年)、谢美英的《〈尔雅〉的文化人类学阐释》(四川大学 2008 年)、黄悦的《〈淮南子〉神话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8 年)、高岚《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明清之际江汉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四川大学 2008 年)、代云红

的《文学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华东师大 2010 年)等;硕士论文有牛晓梅的《人类学小说》(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5 年)、黄悦的《神话与符号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5 年)、李晓禹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兰州大学 2007 年)、代云红的《叶舒宪与文学人类学研究》(华东师大 2005 年)等。

## 二、四重证据法与文学人类学的前景

就发展前景看,文学人类学有两个学术生长点,即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在文学思想方面,要启发本土文化自觉,引导对中国文学的重新认识。受到 20 世纪后期反思人类学派和后殖民批判的影响,研究者积极反思、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范式,倡导本土文化自觉,并充分利用人类学的多元视野反观和重估本土经典本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价值,起到了学术先导作用<sup>①</sup>。文学人类学学者认为,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正在经历“东方转向”、“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以法国学者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知识观,对应的是全球文化寻根运动。在学院派中倡导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新视角,能够启发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和重新认知。

在方法论方面,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注重将人类学方法与本土学术传统的考据法相结合、再造。所谓“三重证据法”,包括文字训诂考据为第一重证据,王国维揭示的出土甲骨文、金文等为第二重证据,增添了人类学、民族学的非文本性参照材料为第三重证据。三重证据法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史研究,也给其他学科带来启迪。如法学方面的证据学探讨。在新世纪初,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再度倡导“四重证据法”,吸取了人类学的“物质文化”概念,将出土或传世的古代文物及图像资料作为文献之外的第四重证据<sup>②</sup>,探究失落的文化信息,以期重新进入中国的文明史和史前史。新出版的《熊图腾》和《神话意象》两书是应用四重证据法的实例。《熊图腾》在整个欧、亚、美三大州的广阔背景中探讨熊图腾崇拜的源流,以及它与中国文明起源、中华祖先图腾(黄帝有熊氏、鲧禹启化熊或熊化)的关系,在如何利用比较文学的跨文化优势,推进本土文化的阐释方面有开拓作用,使得传世古文献中误解的和无解的难题获得重新审视的新契机。例如,司马迁在两千年前记下华夏共祖黄帝号“有熊”,但没有说明原因。古籍中记载的夏王朝三代帝王鲧、禹和启的神话叙事中

<sup>①</sup>如孟华的《符号学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证据科学》2008 年第 2 期)、孟华主编的《三重证据法》(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sup>②</sup>如叶舒宪的《第四重证据:比较图象学的视觉说服力——以猫头鹰象征的跨文化解读为例》(《文学评论》2006 年第 5 期)、《四重证据法:符号学视角重建中国文化观》(2010 年 7 月 17 日《光明日报》)。

都有“化熊”或“熊化”的母题。战国时代楚国的三十位国君要在登上王位之际改称“熊某”。《周礼》所记上古跳神仪礼——雩，有法师“蒙熊皮”的规定。我们将以上传世文献的记载称为研究的第一重证据。但仅靠这些文献证据还无法说明黄帝号“有熊”的所以然问题，正如希腊神话研究本身无法说明阿尔特弥斯女神的祭司为什么要身披熊皮的问题，这就需要广泛借助第二、第三和第四重证据所提示的参照材料。

第二重证据，系指新出土的汉字记录。这是古代学者所没有见到的一些珍稀文本。除了甲骨文和金文以外，20世纪后期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时代的竹简帛书，成为今日学者有幸看到的新文献材料。如在上海博物馆藏的楚国竹书《容成氏》中，有讲述中国历史第一王朝的开创者大禹建立五方旗帜的叙事。其中，东、南、西、北四方旗帜以日、月、蛇、鸟为标志，大禹自己的中央旗帜则以神熊为标志。二重证据表明熊旗乃是夏朝的国旗，熊是夏人的图腾。这就给传世文献中的鲧、禹化熊母题，提供了所以然的解释。

第三重证据，系指口传与活态的礼仪和民间文化等，包括民族学材料。中国功夫中有模拟飞禽和猛兽的组合招法，称“鹰熊合练”。夏、商、周三代的宗教雕塑中屡屡见到坐熊和鹰熊、鸱熊等合体形象。汉字中代表生命能量和能源的“能”字，原来就是专指熊的本字。神医华佗创立的五禽戏中有“熊戏”，让人依照仿生学原则模仿熊的动作来进行养生修炼。凡此种种，联系成为一个熊图腾崇拜的文化整体。

在今日的现代汉语中，熊已经蜕变称骂人的词。

可是在文明的源头和早期，熊曾经是没有狮子存在的东亚地区最为神圣的动物。依靠第四重证据——考古学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女神庙供奉的真熊头骨和泥塑熊像，我们得以了解到失落的文化真相。如果在欧亚大陆上寻觅熊神崇拜的遗迹，还可以举出三万年前法国南部 Chauvet cave 祭坛熊头和彩绘神熊出洞图像。据人类学和神话学的分析，熊之所以在数万年前就被狩猎的人类祖先所神化，因为熊冬眠的习性被理解为拥有死而复生的生命能量。汉字“能”本义指熊的事实，最好地说明了神话联想的发生根源。就这样，依靠四重视野的多元证据，阐明了几千年来莫名其妙的“有熊”和“化熊”叙事，找出华夏文明在前农业时代的古老信仰根脉。

就理论建构而言，对四重证据法的学术发生史进行全面审视，将给未来的文学人类学发展带来广阔空间，有效地促进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研究。目前，《民族艺术》杂志自2008年至2010年的固定专栏《神话与图像》为四重证据法的探究提供展示园地；2009年立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代表着四重证据法的拓展和应用情况；将“神话”概念从民间文学的小范畴中解放出来，确认为文化传统的元编码或原型编码，使之充分发挥打通文史哲和宗教、心理学等学科界限的工具利器。目前，这一方法的应用正在走向多学科打通研究的尝试。2010年8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的“神话历史丛书”，体现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群体的这种新探索方向，以神话概念作为重新贯通文史哲的思想工具。

##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The Anthropological Turn of China's Literary Thought

YE Shu - xia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comes from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at arose rapidly in the 20th century. Now China's literary idea and thoughts turn to the multi-perspectives, which can be generalized as an "anthropological turn". This paper surveys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sorts out the academic idea and paradigm. The view of "local knowledge" gives a reform of th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reflecting the theoretical forming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By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and comments on "Yellow Emperor's Style Youxiang", the way of fourfold proof can have a bright future in the researches of humanities.

**Key Words:** anthropological turn; literary anthropolog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regional culture; way of fourfold proof

[责任编辑、校对:王维国]